

喻众象殊，相持并存^{*}

——论亨利·詹姆斯小说理论的隐喻特征

陈秋红

内容提要 隐喻思维和隐喻语言是詹姆斯文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对詹姆斯小说理论中的隐喻进行梳理和分析，将会对其文本的模棱两可或晦涩难懂有更合理的理解和解释。本文以詹姆斯的小说理论术语为对象，从故事基础、精神过程、批判思维、审美理想和小说的建制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梳理其语言风格与哲学、符号学语言哲学之间的关联，发现隐喻语言对于詹姆斯理论建构的关键作用，为詹姆斯筹划未来小说理论之功一辩。

关键词 隐喻 经验 印象 意识 想象

詹姆斯的小说序言和文学评论中充满了大量的隐喻，可以说，正是借助隐喻，詹姆斯含蓄地表达着他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和预见。对这些隐喻族群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更清楚地见出詹姆斯如何利用隐喻在意象间的潜沉、扩张作用，以诗化语言提出了小说的观点和预言：小说的真实是通过意象展示的苏醒了了的“自我意识”的真实，是纷繁复杂的意识网络在文化传统动摇之时的种种经验的形象呈现。现代小说承担着“讲述一切”的历史责任，小说文体则演变成为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①小说家的使命便是充分发挥艺术家的自主和天才，以文学形式的探索与革新为己任，以不同以往的文学手段，为人类对“自我意识迷宫”的突围寻觅出路，以此搭建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文学伦理及社会伦理范式。

詹姆斯认为，“予人以真实之感是一部小

说的至高无上的品质。”就反映真实的程度来说，“正如绘画之为现实，小说就是历史。”但他同时强调，小说真实性效果的培植，应该“归功于作者在制造生活的幻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个成功的取得，对这个精妙过程的研究，就我的情趣来说，构成了小说家的艺术的开始和终结。”^②“要表达出最单纯的外表，要制造出最短暂的幻觉，却是一桩非常复杂的事情。”^③由此可见，詹姆斯的小说真实观即是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展开的一个“精致微妙的过程”。如何展开这一过程，如何让小说这个“有生命的东西”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有机体”和“整体”？詹姆斯就此发表的意见是“要努力成为一个凡事莫不让你产生印象的人”，而“经验是由许多印象构成的，印象就是经验”。^④作家将“印象”和“经验”经“意识之室”中“美丽的蜘蛛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亨利·詹姆斯的隐喻思维与小说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2BWW025）的阶段性成果。

网”^⑤捕捉和转化,成功地“制造和获得幻觉”。詹姆斯正是运用这样的隐喻思维,想象建构着“小说大厦”(house of fiction)。^⑥词语在隐喻思维的作用下,如基石与栋梁,搭建出“美丽而缠绕的蛛网”,捕捉着真实经验的“空气和色彩”。

一、故事基础: “无人踏过的雪原”

詹姆斯认为,每一部作品都通向一个独立存在的想象世界,每一部小说都是作者以精心选择的“故事基础”(matter of the tale)为契机,将故事的蕴含之意与作者的想象融汇创变为一种新的叙事意图。这个基础(matter)就是作品的基本品质,是独立于记录它的文字的。“基础”一词的古义,是指一组叙事材料或事件(events),据此可以生发很多不同方向的叙述意图。在中世纪人们会说“亚瑟王故事”,或“特洛伊故事”,意思是集中于亚瑟或特洛伊战争的全部传说的总和。“基础”形成了一个本质的支撑层或基础层(substrate or “subjectile”)。“Subjectile”是法语词,指绘画下面的基础层、纸或灰面。德里达在题为“解构基础层”一文中,为“subjectile”所下的定义是:

这是绘画界的一个词,指的是以某种方式处在下方的东西,作为内容,作为主题,或作为“succubus”。在底层和上层之间,它既是支撑,也是一个平面,有时也是一幅画或一个雕塑的材料,它是脱离于形式的东西,脱离于意义、再现的东西,它是无法再现的。^⑦

在纽约版《金碗》的序言中,詹姆斯把《金碗》的“基础”比喻成一大片“无人踏过的雪原”。他说,当他重读这部小说时,他的

“双手一触到本源就感到满满的”。这个“基础”或“本源”是“以无数的形式出现、并且对任何一种新的照料(指重新阅读或修改)做出十分动人的反应的好材料,似乎用很少的话同我达成了一项令人愉快的交易……所有这些显然意味着,整件事情是活生生的”。^⑧这一“活生生的”“基础层”命意,体现了詹姆斯表达“印象”和“经验”现实的最基本的、也是总体的创作理念。

詹姆斯的“故事基础”,既是一个实际实体(皑皑白雪),也是一个与永恒宇宙合成一体的无数事实的一部分,是一个“实际实有”(actual entity)在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相互联系及不断生成的一个“超体”(superject)。它有着在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推动下持续生成的实际事态和进展“过程”(process)。^⑨它在不断生成新的事态的同时,“消亡”了主客体的界限,并随时成为将来一切主体的一个客体。它不是独立地存在于存在之外的一个神话,而是在一个多元宇宙中,经主体选择之后的无数事实的一个“个体特征”的合成与展示。这一展示的介质便是词语。

詹姆斯以其隐喻的词语,在他几乎每一部后期小说中,都在告知读者独特的另一现实,一个超现实。它们以隐喻作为替代的形式,使用那些指称社会、心理、历史、物理现实的词语,来称呼它们发明或发现的超现实。那片“皑皑白雪”之下覆盖着连詹姆斯自己也说不清的“真实”:虽然“我[詹姆斯]清楚地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以及那无数页记录下来的东西……我却根本无法预测这些机会、这些变化以及变化的比例;它们[词语]只是在我行进时对我显现出它们的样子;而批评则只能尾随其后,为它们所捕获,为它们而惊叹,情绪或失望或欢欣,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整个事态是活生生的”。^⑩

詹姆斯将携带着强烈主观意图的“使节”、“鸽翼”和“金碗”等意识图像,以隐

喻的语言，使其“返回”小说的客观“基础层”。“基础层”与语言合力作用下，具有了作者“无法预测”的独立性和强制性。詹姆斯在重新阅读《金碗》时，以一贯的铺张风格，描绘了重新利用“旧基础”或者说被“旧基础”所利用的欣喜与骄傲：

对于一个富于哲理的头脑来说，几乎就像对“绝对”这一概念恍然大悟那样使人精神振奋，或者至少同样重要。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在如此容易的情况下体会到“绝对”之感更为令人高兴的呢？^①

可以重新利用的“故事的基础”让詹姆斯体验到了“绝对”。“绝对”在词源上是指自由、无差别、无等级的终极意义，是哲学意义上的虚无，是文学中的抽象和一无特征。具备了这样的“故事基础”，小说将“实体存在”形而上为一种观念上的象征物，这一象征具有永恒性，接近于神话本身而依然保持着“实际事态”的特性。持续不断的隐喻成为文本话语的一种策略：通过隐喻的叙事策略，“语言放弃了它的直接描述功能，以便达到能发挥其发现功能的神话层次”。^②“神话是一切之本，它戏剧性地表现了我们隐藏最深的本能生活和宇宙中人类的原始认识；它具有许多想象力构造力，而所有独特的思想和见解都基于这些构造力。”^③

“无人踏过的雪原”恰似“绝对之物”（entities, A. N. 怀特海谓之独立实体，抽象概念），能够承载“自由的脚步”，踏出不同尺寸和方向的阅读脚印。对詹姆斯后期小说风格的众说纷纭，其实是选择不同角度阐释的不同结果。“使节”、“鸽翼”和“金碗”等意象，是作者精心选择的词语符号，因其可在神话渊源、词源、现代命意以及小说人物的真实使命之间自由穿梭，多向度地展开事态的过程。这一叙事策略经过前期及中期的实验准

备，在1890年以后，进入了圆熟又不断修正的时期。选择一个“绝对”、“多元复合”的意象解构作为“实际存在”的故事基础，詹姆斯在新世纪来临之前，为小说“写什么”的问题，完成了哲学的思想准备及语言实验的经验积累。

二、精神过程：捕捉 “意识迷宫的银色线索”^④

“迷宫”是批评界描述詹姆斯小说特征时的关键词之一。1903年英国《伦敦每日邮报》评价说，“詹姆斯先生与生活之关系，犹如惠斯勒山之于自然，这位艺术家究竟试图表露何物，对此我们依然一头雾水。”^⑤

詹姆斯的小说理论，亦始终贯穿着犹如“地毯中的画像”般的意识图画，以特有的节奏、形式和纹理，将“艺术创造生活、创造有机生活的启示、暗示及痕迹”^⑥以隐喻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詹姆斯找到了“将主观精神状态通过观念表达传达给别人”的有效途径。詹姆斯注目于人的精神世界，讲述意识领域里的不凡故事，以天才的独创性与想象力，在开拓小说“写什么”的疆域之时，也变革了小说理论“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模式。

詹姆斯认为，“小说像人的气质那样千变万化，各不相同，他们的成功在于合比例地展示出了各自精神的独特之处。”^⑦詹姆斯独特的心灵气质，使他乐于在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背后，捕捉到别人难以觉察的印象：

我几乎使自己迷失于那大量的晦涩模糊的东西之中了，说它晦涩模糊，无疑因为它是由种种微妙的东西构成的：这些东西难以捉摸、影影绰绰、无法揣度、莫可名状，它们为那些深沉而信心十足的变化的种种过程服务。^⑧

詹姆斯有关“心灵”、“心理”等概念的运用,究其实质,都与“自我意识”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内涵。詹姆斯通常更愿意把这叫做“意识”。“意识”似乎是詹姆斯与生俱来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抽象的问题。詹姆斯的后期小说表现出许多与自我性有关的意识,这一“意识”观念,在维多利亚时代是超前甚至是“渎神”的。詹姆斯在超验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

经验是从无止境的,它从来也不是完整无缺的;它是一种漫无边际的感受,是悬浮在意识之室里的用最纤细的丝线织成的一种硕大无朋的蜘蛛网,捕捉着每一颗随风飘落到它的怀中的微粒。它就是头脑的氛围;当头脑富于想象力的时候——如果碰巧那是一个有天才的人的头脑的话,就更是如此——它捕捉生活的最模糊的迹象,它把空气的脉搏转化为启示。^⑩

詹姆斯以“自主艺术家”的警觉和想象,对“意识”张开了无穷的探究。詹姆斯将生活现实的“迹象”、“氛围”等客观事实置于心灵的,即意识的主观感受框架之中,主客观两个世界之间“漫无边际”又“内在关联”的丰富样态在想象力的架构之中得以逼真呈现。而这一呈现也暗示出观察者本身主观意识的经纬走向。

詹姆斯的文学批评的独特语言,是自觉地使用隐喻思维与隐喻修辞的成果。隐喻能将“内在生活的诗意形式”与“诗歌结构的客观性”结合起来,形成“某种可以形象化的现象,它可以有效地被观察到或被简单地想象,它可以用作表达有关人的内心生活或非空间的一般现实性的某种东西的手段”。^⑪詹姆斯后期小说的隐喻叙事既是他的偏爱,也是他在那个普遍信仰摇摆不定的时代“微言大义”的不二选择,是将质疑与坚守这一矛盾复杂的犹疑

26

心理微妙地呈现出来的话语策略,因为,隐喻可以“把主客观这种相互关系由混乱和漫无边际的状态提升到两级紧张对立的状态”,同时隐喻又表达了“主客体二元对立之前就已存在的内在情感的融合,并对主客观之间的对立状态进行了调和”。^⑫

詹姆斯的“写意识”,是以隐喻思维的形式对人的精神领域的探索和扩展,它打破了题材和体裁区域孤立的僵化的分隔,将玄想思辨与理性认知连接在一起,在规则性的语法概念与文学的诗性沉思之间,以隐喻语言特有的融汇与演化功能,派生出一种新的小说概念。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传统文学概念,却是现代小说从纯粹理性分析规定的所谓学术性的概念中脱颖而出一个必要成分。这一“观念的冒险”,^⑬伴随着20世纪各种现代与后现代理论的纷至沓来,愈加显现出其开拓思维疆域的价值。

三、批判思维: 隐喻叙事与视角的伦理范式

视点在“詹姆斯式”的小说创作中,不仅仅是作为辅助性的技巧,还是构成独特人物身份的可信性因素。詹姆斯的创作,为后续理论家建构一种与视点相关的“视点伦理学”提供了范本。詹姆斯强调叙事视角与伦理道德统一性的关系,得益于他创作初期便在屠格涅夫的小说观念中汲取的营养。詹姆斯在1874年评屠格涅夫的文章中写道:

[屠格涅夫] 对于我们的灵魂的奇妙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富于激情地不断转换视角,目标却始终如一——去发现偶然事件、一个人、一种情景的道德意味。他的长处就在于,这与他表面上的过于注重细节构成一种内在和谐。他相信艺术中题材的固有价值;他认为存在着微不

足道的题材和严肃性题材，后者肯定是最好的，其优越性在于它们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人类心灵的更为大量的信息……屠格涅夫之不凡魅力在于，他透过碎了的玻璃，观察到了更多的人性构造特征。²³

詹姆斯注意到，屠格涅夫的方法是一个探根究底的现实主义者的方法，他在气质上是一个专心致志的观察者，这种观察带有普遍意义，不偏不倚，更具有真知灼见。在选择视角之初，作家主观上便准备好了进入人物性格内部构造的“态度”：客观、深入，但并非绝无判断及主观导向。屠格涅夫的手法是用生动逼真的“古怪”之处使人物具有特点，人物细微习性的“怪异”和人物激情背后的不同动机，隐含着教训和意味，能够启迪聪明的读者回味其价值。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树立了一个道德含义赋予形式以意味，形式又凸显了道德意义的重要范例”。²⁴正是在这一点上，詹姆斯捕捉到了与自己气质投合，与自己的道德价值观相符的主题及写作方式。

詹姆斯在《使节》序言中指出，“深水坚桩”形成的“环流视角”直入人物“意识醒悟的过程”，这便是小说的“绝对的主题”，人物内在世界的微妙变化与外在经验世界之间，形成道德统一的行事标准和方式。主人公斯特瑞赛对周围环境形成影响，四周环境又与之经验合纵并行，每一人物皆有使命，小说形成一个使命共同体，完成着历史的使节之命。《使节》选择一个不入世之人，以其入世之行的所见所闻带来的意识变幻过程，将读者带入一个作者精心设计的叙述境遇中，作者讲述人物意识中发生故事、书中人物不断思量自己的意识冒险，读者伴随人物曲折之精神思量过程的同时，感受到这一“内在世界”的品质及价值，不自觉地做出衡量及判断。

以形而上的意识视角“讲故事”的方式，在以情节为重要结构因素的传统批评语境中，

往往遭遇批评有欠公允的待遇，正像詹姆斯所说，“一切刻板的批评模式都或多或少是不公正的，因为对于屠格涅夫来说，说他仅仅是个目光锐利的观察家并非全面，他的想象力始终参与其中，并发挥出它固有的作用。”²⁵詹姆斯意识视角的选择及其伦理价值的赋予，并非仅仅出自作者的主观必然，也不仅仅建立在作者个人经验的基础上，而是现实生活中，人们鉴赏与判断的所有假设，都存在着一种普遍赞同的必然性，即存在一种本质的共同感的客观前提。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对此一现象有所分析：

我们并非把我们的判断放在概念上，而只是根据情感，这一情感不是作为私人的情感，而是一种共同的情感……这一共同感……我赋予它范例的有效性，它是一种理想的规范。它涉及不同的诸判断者的一致性，就像对于客观的判断一样，能够要求普遍的赞同。²⁶

汉娜·阿伦特认为，康德发现了人的新的认知能力——判断力。这一判断力超越了一般审美判断，而又将道德判断分离出去。换言之，正当或不正当（道德）的问题，不是由审美力或判断力来决定的，而仅仅是由理性来决定的。²⁷但从总体来看，康德对判断力的论断恰恰是在理性（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展开的。在人的鉴赏力与想象力的关联之中论述的理性，有着鉴赏特有的感性的、想象的自由，以及合规律的“普遍赞同”。想象力本身是创造性的和自发的，同时又是自由的、合规律的。想象力在自由活动，有一种与悟性的合规律性一般协调的状态。²⁸这一既矛盾又协调的理性特征——想象与悟性——体现了人类特有的批判思维之能力，在天才作家的思辨性作品中，这一批判思维（特别是悟性）能力得以充分体现。

屠格涅夫和詹姆斯都在观察并描述人物主体特征的同时,使用了想象、鉴赏和判断能力,而这些能力的综合架构,正是理性作用的结果。尤其当视角选择的对象是人的内在世界或意识领域时,理性地旁观、分析及判断恰恰是对感性经验之表象的由表及里的深入见知。文学想象在不自觉的模仿、反应中,创造性地表现出未知之理想境界,对人物命运及其遭际环境的同情或批评,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由悟性而引出“共同感知”的合理评价。文体与道德评价的共同运化作用,使小说打通了经验领域与理性批评的边界。借助于20世纪各种科学理论和哲学范畴的创新理念,詹姆斯的小说和小说理论本身也发展成一种有机的文学样式。小说形式与内容的比例更像是一个“有机机械结构”(organic machinery structure),它受制于作家的主体意识,又自成一体,在叙述过程中,或多或少呈现出越过“黄金分割”的独特比例之美,一种“詹姆斯式”的意味。正如詹姆斯在《小说的未来》中所言“生活不断地将自己投射于人的想象,而小说是所有试炼这一印象的方式中最好的一种。”^②

四、审美理想:从已知见出 未知的想象与判断

1902年,詹姆斯在为巴尔扎克《两个新娘》英译本所做的序言中称赞巴尔扎克具有一种“最伟大的力量”,认为巴尔扎克对精确性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激情,对于所有实际的种类实际事物有一种“吃人妖魔似的欲壑”。詹姆斯对巴尔扎克的“天才的真实情况”做了以下结论:

一方面,他有着十分密实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近在眼前的、物质的、当前的事物“杂拌儿”永不厌足的笔录员,永远为历史学家的冲动所操纵,不停

地对材料整理、保存和阐明。人们读着他的作品,往往询问自己,这么多的计算和这么多的批判,这么多的统计和文献与诗人有什么相干,这么多的激情、人物和冒险与批评家和经济学家又有什么关系。这种矛盾常常摆在我们面前;它源于作者此两面之比例紊乱;它更好地解释了他作品的怪异和难点。^③

詹姆斯以其惯常的幽默和讽喻的语气,“肯定”巴尔扎克的同时,也指出了巴尔扎克作品“缺乏优雅的风韵,缺乏与娱人的文学形式结合在一起的那种轻快的情调”。詹姆斯进而追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特殊的好奇心有着特殊的回报,巴尔扎克作为艺术家的巨大好奇证明了这一点。但巴尔扎克在那同等规模上的挫败正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那些散落的部分,人物的个性“disjecta membra”,^④在这儿是如此众多,如此光彩夺目,甚至证实着误入歧途;我们把它们堆积起来,堆成了一个纪念碑,它构成一个漫溢越顶之像。这一天才的漫溢之像矗立着,或许,对一个艺术家的无能之处,它的确是一个完美的教训。^⑤

詹姆斯认为,巴尔扎克的巨大而丰富的想象力,被他那“艺术家兼生意人”^⑥对“有用”结果的感觉所辜负了。犹如一个“命运开的玩笑”,20年间“那命运骑着它急奔疾驰”,而“他却长时间找不到内心的启示”。而且,詹姆斯又大胆发问:意欲描绘整个人生的巴尔扎克,“他对人生描绘得比别的形形色色的小作家更多吗?”在詹姆斯看来,巴尔扎克仰仗其想象力要雄心勃勃地写出“历史的绝对性和庄严性”,是一种“误入歧途”。

詹姆斯并非否认巴尔扎克对真实事物的描

写功力，而是认为巴尔扎克将创造力过多地耗费在对事物外在的逼真描摹上。詹姆斯早在1899年的《小说的未来》中就提出，艺术家应当是这样一个人：“从所见猜出未见之处，并揣摩出其相关性，能够感觉到生活的全面而完整的模式和境况，并据此加以判断。如此，方可从容地按自己的方式去了解生活中任何特殊的角落。”^③詹姆斯秉承屠格涅夫的“少结构”、“多性格”的写作理念，并以自己独具慧眼的洞察力，将巴尔扎克分散的人物性格“碎片”，以意识中心统一“堆积”起来，在人物言行的腔调里，在琐细幽深的精神领域中，发现为现代人匆忙掠过或忽略不计的“巨大的一堆”。他在“巴尔扎克挫败”之处，将看似孤立的一个个角色，一个个游离的人物，一个个形象中包含着的巨大潜力，“构成一个巍然耸立的形象”。从《罗德里克》的马尔·马莱特的意识中心，到《女士画像》“以一个少女的性格”开启“一粒种子破土而出的必然趋势”，从《螺丝在拧紧》的灵性故事，到《圣泉》的主观认知谜团，再到后期三部对文明遇合之际遇的大隐杰作，詹姆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发现了小说的“新大陆”，发现了才智和想象力的用武之地，开辟出了“特殊而神秘”的意识领域，“想象”并构造了欧美两个大陆的“未来之像”。詹姆斯的“才智冒险”是倾心于“把外部感官感知到的东西”变成“适合于内部感官的东西”的天才判断。隐喻在意识中的游弋及对意识的呈现，让詹姆斯以精神之眼看到了他所描绘的特殊事物的未来之整体性，即在现实经验世界中，人作为意识的主体和审美主体的行为能力，以及约束或激发主体能力的美与道德的判断力依据。

詹姆斯坚持艺术家的感受力和类型的相异性，强调在适宜的土壤上，作家方能将想象力和好奇心尽情发挥。艺术家的个性笼罩一切，并最终影响作品的价值。那些“现实主义作

家的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有限的好奇心以及对于特殊感知的概念的缺乏”。^④一个作家的想象力和审美判断力是其作品价值品相的保证。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言：

想象力在一种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方式内不仅是能够把许久以前的概念的符号偶然地召唤回来，而且从各种的或同一种的难以计数的对象中把对象的形象和形态再生产出来……想象力做这事是凭借一种力学的效果，这效果是由这诸形态的复合的印象对于内在感觉器官生出来的。想象力的规范概念不是从那自经验取得的诸比例作为规定的规律引导出来的；而是依照规范概念评定的规律才属可能。它是从人人不同的直观体会中浮现出来的整个种族的形象，大自然把这形象作为原始形象在这种族中做生产的根据。^⑤

康德提出想象力既是自发、自由的，又依据一定的“规则准绳”。只有既符合美的条件又符合美的准则的东西，才是理想的美。而“美的理想”，在人类中，表现为道德：

内在地支配着人的道德观念的可见的表现固然只能从经验获得；但它和一切我们的理性与道德的善在最高合目的性的联系中相结合着，即心灵的温良，或纯洁或坚强或静穆等等在身体的表现（作为内部的影响）中使它表现出来：谁想判定这，甚至于谁想表现它，在他身上必须结合着理性的纯粹观念及想象力的巨大力量。^⑥

依据对“美的理想”进行想象、创作和批评，詹姆斯的审美理念与康德的哲学美学有着同声共气的关联。正因如此，才有了詹姆斯对巴尔扎克的那番“异见”。在对法国其他作

家的评价中,詹姆斯也以其一贯的说真话的讽喻,表达了他对艺术之审美理想的清醒认识。他称赞福楼拜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但对《包法利夫人》这部“最具文学性”的小说,詹姆斯却挖苦其题材的“粗俗”,认为尽管“她反映了她的创造者的许多方面的东西,爱玛·包法利的遭遇实在是一桩太小的事”,它只是“所表现的相当粗俗的事物一个无法超越的最终形式”;而《情感教育》“带着它的美丽的片段和普遍的空虚,带有在它所蕴涵着的哀伤中的一个漏洞,而且,它的道德的崇高性就从那儿溜掉了”。^③詹姆斯与福楼拜在文体风格和语言上都追求着“俄尔甫斯和他的竖琴”的至臻之境,但詹姆斯并未忘记,在同“难以驯服的(语言)工具”做斗争时,“美的理想”所应具有“独特而神秘”之规则。或许正因如此,伊迪斯·华顿才会评价《金碗》人物的“悬空”之感。因为,想象力对巴尔扎克或福楼拜所敞开的区域,与詹姆斯的想象空间,并非同一个方向。詹姆斯中后期小说对题材的选择、对人物的定位、对语言的苛求,皆服务于他为自己设立的理想之美的目标,皆围绕着塑造高级文明之未来世界的远大愿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的确不是在写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以哲学家的思辨和历史学家的洞察之力,为小说艺术的题材和形式做出变革和实验,为融合古典传统与现代美学的可能做出“献祭”。

詹姆斯小说理论中有关“天才的断言”、有关“才智冒险”、有关“蛛网缠绕”等“想象力活动”的隐喻,描述着其艺术思维的个体特征,以及这一特征在其前后期文论中“如一粒种子”发育变化的过程。纽约版序言中表达的小说理念,与前期有关小说艺术和小说未来的理论之间形成的互动关联,呈现出其思维整体不断变化、不断补充修正的运动过程。序言中隐喻思维的大量增值,标志着詹姆斯洞察融通的综合思维功能的成熟。在想象力

的推动,詹姆斯似乎观看到事物变化过程的整体。以隐喻思维和隐喻的词语,詹姆斯推动小说理论向着更为意象化的方向发展,向着事物的实体实在与主观意志契合相谐并最终构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的理想化的方向发展。詹姆斯的隐喻对他同时代的同行以及普通读者来说似乎是一个难解的语言之谜,但在当下各种哲学和语言学理论综合作用之下,在经过结构与解构大潮的后现代之后,詹姆斯的隐喻语言却成为解答各种理论之谜的解答工具。

五、讲述一切的小说

詹姆斯的纽约版18篇序言,其话语风格与一般的小说理论不同。大量运用的形象化表达使“话语的偏差”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改变”。这一改变是詹姆斯在话语的语义规范之外建立起自己话语规则的尝试。一种基于对心灵与精神的实际实在探查的主题,需要将尚处在模棱两可之间的意识活动,隐含在字里行间,以“语言的双重性”陈述,使潜在的概念成为“透明的可见性”。换言之,詹姆斯的话语风格具有利科意义上的“修辞的零度”:它既不是热内特意义上的潜在的结构,也不是科恩意义上的现实结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结构。^④这一“建构出来的结构”,是以隐喻的方式将词语的潜在涵义,以意象组合的现实意义呈现出来。隐喻因其对于信息造成的偏差或补充,同时满足了主观的或然性和期待性(包括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隐喻使得修辞学对字面意义的地位以及文学语言的地位有了重大发现。^⑤

詹姆斯的隐喻在古典主义的摹仿论和浪漫主义的“幻像”(vision)或“创造”(poiesis)论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它既是摹仿的,又是创造的。它在摹仿中创造,它构造了被摹仿之物。詹姆斯的隐喻思维在古典和现代之间

达成了“和解”。这一“和解”之像，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其《象征理论》一书中有更清晰的表述。他认为，西方符号学的古典主义时期是以奥古斯丁对一系列异质影响的汇集而告终的，而现代美学符号学的诞生则是以与歌德同时的莫里茨为标志的。他引用过莫里茨的《神的学说》中的一段话：

普罗米修斯用水滋润了尚沾满天上粒子的大地，并按上帝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就只有人才把目光朝向天空，而所有其它动物都把头垂向地面……为此，在古代艺术作品里，普罗米修斯脚下总有一只罐，面前一个人的上半身，他正用黏土在造人。他所有的注意力好像都集中在创造上了……因此，形成的时刻先于以往形成的结果，突出的项是产生的过程。^①

在托多罗夫看来，莫里茨的浪漫主义美学符号学，强调美的性质是一种内部存在，它在思维能力的范围之外，它有着非理性的因素，它呈现过程的美。托多罗夫还援引过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勒的《雅典娜神殿》中的这段话：“当综合哲学和综合诗成了普遍的和内在的，当用多种性质互相补充构成共同作品这种现象不再罕见时，也许一个崭新的科学和艺术的时代就开始了。”^②托多罗夫还认为，诺瓦利斯关于音乐与绘画的比较，代表着浪漫派推翻“摹仿原则的专制制度”。在埃科等符号学家看来，作为书写的语言以其“秩序”建立者的姿态介入了根据社会支配秩序的现实，并对现实世界的事物状态进行分类，确定其轮廓并指定期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语言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沟通，而是赋予秩序。当“言语—行为”发生的同时，书写语言以其“秩序的词语”对世界进行了编码，现实社会的支配秩序也因此得以确立及强化，即：语言牵引了世界的“非实体的转变”。在这一意义上，詹

姆斯的文论语言的确是一种创造秩序的艺术编码。这一编码促使读者在三个层面上同时理解其意义：生活印象的图画理论、证明的理论和被理解的意义的证明。^③詹姆斯三论并进的思维及语言风格，使理解进入到间接理解事物的“临界状态”。^④

詹姆斯在《女士画像》纽约版序言中，以“小说大厦”、“窗口”和“阳台”之喻，强调“驻足”于不同“窗口”的艺术家个人的独特视域，强调在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认识和书写中注重各个不同部分之间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的特质。詹姆斯的“小说大厦”之喻是一系列小说实践的集大成之标志性词语。找到自己的观察与表达之域，在传统之外观照传统的可参照性，詹姆斯在一般作家的外向视野之外，发现了更加广阔的内在世界。这一内在世界更具现代思想的观念与理趣，因此更需要现代思想家在高倍显微镜的科学透视下，将微观世界的变化逻辑探个究竟。隐喻的话语作为观者或被观之物之间的语言介质，将作家眼中的实际实在之价值，转呈与读者或听者的感官（视觉或听觉）。在看与被看的双向进程中，话语的信息不断地被判断、修正，进而更深入地沉潜到事物存在的本真状态，隐喻使“多余的信息构成了语言的所有使用者的内在知识”。^⑤

正如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所言，“夫院本、小说正类诸子、辞赋，并属‘寓言’、‘假设’。”^⑥寓言、假设若非隐喻修辞和意象虚构则无可言实。因言实不得，则假以喻指。詹姆斯隐喻思维的叙事策略，是对圣经传统的继承，又以但丁和莎士比亚将隐喻作为“政治修辞术”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文学与时代关系更替的认知。文学作品的政治修辞术，往往出自作者的社会理想或政治态度，出自未愿或未敢明言的谨慎态度。作者通过隐喻，以有意或无意的“障法”来“彰显”真义，如荀子所云，“言之当理，事必当务……若夫充虚

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④詹姆斯的“文体之辨”以隐喻的行文在明白与隐晦之间寻觅一条弥合的界面,读者需要在字里行间认真搜寻,方能识得作者的真义。隐喻思维强化了创造文本与阅读文本的想象叠加,最终使文本成为喻众象殊,相持并存的意义的海洋。

詹姆斯充满隐喻的、写给未来的小说及小说理论,似乎是以现代人对古典修辞传统的回归,论证着“向后看”对于文明未来出路的可能。詹姆斯的隐喻修辞,意在以模棱两可的含混价值,在现代与古代互看的价值转换中,生成新的小说诗学。“詹姆斯式”的隐喻语言,彰显出现代思想与表达的独特价值。它既费解难估,也是当代批评理论的宝贵遗产。

注释:

- ① 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4页。
- ② 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in *Essays on Literature*, V. 1.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US, 1984), p. 53.
- ③ 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p. 53.
- ④ 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pp. 51 - 53.
- ⑤ Henry James, “The Preface”, in *Essays on Literature*, V. 1, “The Golden Bowl”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US, 1984), p. 1338.
- ⑥ “小说大厦”是詹姆斯在《女士画像》纽约版序言中提出的小说理论关键词。“小说大厦”与窗口、阳台、花园和门等隐喻,一同构成了詹姆斯立足个性化视角,发现不同生活印象的小说理论术语。
- ⑦ 参见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16-118页。
- ⑧ Henry James, “Preface of *The Golden Bowl*”, p. 1335.
- ⑨ 此处几个术语的引用,参考了A. N. 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周邦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
- ⑩ Henry James, “Preface of *The Golden Bowl*”, pp. 1334 - 1335.
- ⑪ Henry James, “Preface of *The Golden Bowl*”, p. 1330.
- ⑫ 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339页。
- ⑬ 马克·肖勒尔《威廉·布莱克的政治远见》,转引自王先沛等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6年版,243页。

- ⑭ Henry James, “Preface of *The Golden Bowl*”, p. 1333.
- ⑮ “The Ambassadors”, *Daily Telegraph*, 9 October 1903, p. 6., in Henry James, *The Contemporary Reviews*, American Critical Archives 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89.
- ⑯ Leon Edel, *The Treacherous Years* (New York: Avon Books, 1969), p. 148.
- ⑰ 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p. 50.
- ⑱ Henry James, “Preface of *The Golden Bowl*”, p. 1336.
- ⑲ 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p. 52.
- ⑳ 保罗·利科《活的隐喻》,338页。
- ㉑ 保罗·利科《活的隐喻》,339页。
- ㉒ A. N. 怀特海在《观念的冒险》中提出了观念冒险对于提高和保持文明的重要作用。冒险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某些观念在加速人类通往文明的缓慢进程中所产生的作用,这便是人类历史中观念的冒险。另一层意思是:作者在建构可以解释历史冒险经历的一个思辨的观念体系时,他所经历的冒险。参见《观念的冒险》,周邦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1页。
- ㉓ Henry James, “Ivan Turgenev”, in *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 French Writers, Other European Writers and The Prefaces to The New York Edition*, ed. Leon Edel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p. 973.
- ㉔ Henry James, “Ivan Turgenev”, p. 976.
- ㉕ Henry James, “Ivan Turgenev”, p. 974.
- ㉖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78页。
- ㉗ 参见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235页。
- ㉘ 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78-79页。
- ㉙ Henry James, “The Future of Fiction”, in *Essays on Literature*, V. 1.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US, 1984), p. 109.
- ㉚ Henry James, “Honnore De Balzac”, in *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 French Writers, Other European Writers and the Prefaces to The New York Edition*, p. 93.
- ㉛ 原文为拉丁短语,意为“混杂、碎片”。
- ㉜ Henry James, “Honnore De Balzac”, p. 93.
- ㉝ Henry James, “Honnore De Balzac”, p. 96.
- ㉞ 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p. 53.
- ㉟ Henry James, “Preface”, in *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 French Writers, Other European Writers and the Prefaces to The New York Edition*, p. 1093.
- ㊱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72-73页。

- ⑳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74页。
- ㉑ Henry James, "Gustave Flaubert", in *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 French Writers, Other European Writers and the Prefaces to The New York Edition*, p. 326, p. 329, p. 345.
- ㉒ 保罗·利科《活的隐喻》，195页。
- ㉓ 保罗·利科《活的隐喻》，197页。
- ㉔ 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王国卿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197页。
- ㉕ 详见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211页。
- ㉖ 埃科认为，人们对某个词语有不同的理解，但却不必认为这些理解有着共同的理论原理。“三个不同主题的理解理论”引用了皮尔士的符号理论概念。参见翁贝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12页。
- ㉗ 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99-100页。
- ㉘ 参见保罗·利科《活的隐喻》，197页。
- ㉙ 钱锺书《管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1302页。
- ㉚ 《公孙龙子》有“坚白论”，《庄子·天下篇》引惠施“合同异”之说。任继愈评价两说的根本在于：“大同”“小异”之说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可据万物的“毕同”“毕异”之理，将相同性质和不同性质的事物，以抽象的“合同异”统一起来。详见《中国历代文论选》（《战国策·荀况》），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51页。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丽明

英文提要

Author Freud: Michel Foucault on Freud

ZHANG Jin

In “What Is an Author?” , Michel Foucault mainly discusses in what kind of function and in what way the “author” is related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modern social system , namely , how the “author” is constructed and named by the capitalist society , and how it works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o maintain existing cultural mechanisms. Foucault denies the self-evidentness of the concept of “author” , and refuses to name and analyze the “author” in the sense of pure literature. As Ziegel puts it , Foucault places literature and author at the level of “self-criticism”. Besides , Foucault also mentions another kind of author as different from the author of literary works , such as the founder of sciences and the “founder of discursivity” , insisting that the former is superior to the latter.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some Michel Foucault’s important works to illustrate why Freud is an “author” in the sense of “founder of discursivity” and how Foucault enriches the concept of “author”.

French Literature and Other Literatures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Alain FAUDEMAY

French literature has consistently occupied an eminent plac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 close connections have been maintained between French literature and other European national literatures , and these links can even extend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 including Asia , Africa as well as America.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 with abundant details , several historical episodes of reciprocal dialogues ,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erms of language expressions , literature and art forms ,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ideological schools. It delineates various aspects and trajectories of the fusion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literature.

Metaphor and Signifying: Metaphorical Thinking in Henry James’s Theory of Fiction

CHEN Qiuhong

As salient features , metaphor and metaphorical thinking are a noticeable part of the theory of fiction by Henry James. It evokes ambiguity in almost all of his texts. To analyze some of the special terms such as “impression” , “consciousness” , “imagination” and “web” , we may find the substantial meaning of metaphor and metaphorical thinking that James plans for his latent texts. By doing so we may understand the Jamesian language more appropriately.